

THE MISSIONARY UNIVERSITIES IN CHINA

章开沅 主编
教会大学在中国
孙邦华 编著

辅仁大学

会友贝勒府



河北教育出版社

教会大学在中国
章开沅 主编

会友贝勒府

辅仁大学

孙邦华 编著

天主教

輔仁大學

FU-JEN
CATHOLIC
UNIVERSITY



38-85
215

河北教育出版社

64885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会友贝勒府——辅仁大学/孙邦华著. —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 2003. 12

(教会大学在中国)

ISBN 7-5434-5316-9

I. 会… II. 孙… III. 辅仁大学-校史

IV. G649.28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79154 号

主 编: 章开沅

著 者: 孙邦华

会友贝勒府——辅仁大学

出版发行 / 河北教育出版社

石家庄市友谊北大街 330 号

策 划 / 路殿维 张艳如

统 筹 / 何建民

责任编辑 / 孟保青 袁鸿蕙

装帧设计 / 郑子杰 郭丽娜 王海鲸

印 刷 / 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开 本 / 787 × 1092 1/16

印 张 / 13.125

出版日期 / 2004 年 4 月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7-5434-5316-9/G · 3457

定 价 / 32 元

总 序

过去人们曾经将中国教会大学单纯看作是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工具，殊不知它也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产物，它的发展变化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是培养社会精英的高等教育机构，青年学生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念、行为规范、学业基础乃至初步的工作能力，大多在这里滋育形成。因此，教会大学校园内连绵不绝的中西文化的碰撞与融会，便属于中西文化交流较高与较深的层次。我们深信，教会大学史研究的进展，必将对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的探讨产生促进作用。

迄至1949年为止，中国教会大学虽然只有十几所，学生所占比重也不过是全国大学生总数的百分之十至十五，但问题不在于数量，而在于质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特别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教会大学在中国教育近代化过程中起着某种程度的示范与导向作用。因为，它在体制、机构、计划、课程、方法乃至规章制度诸多方面，更为直接地引进西方近代教育模式，从而在教育界和社会上产生颇为深刻的影响，既包括积极的影响也包括消极的

影响。由此可见，教会大学史又是中国近代教育史不可缺少的重要篇章。

中国教会大学尽管一般规模不大，但大多办得有自己的特色，特别是在农学、医学、女子高等教育方面具有领先地位与较大贡献。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后，随着本土化进程的加速，教会大学的宗教功能逐渐减弱，教育功能日益增长，而且不断加强与社会联系并为社会服务。它不仅通过自己培养出的专业人才，而且还通过在校师生的专业实践，直接在若干领域为中国的现代化作出重要贡献，如金陵大学的农业改良与农村调查，燕京大学的新闻学系与社会学系，华中大学文华图专的图书馆专业，东吴大学的比较法学，圣约翰的商科等等，在社会上都有出色的表现。

中国教会大学由于它的特殊地位，在一个较为封闭的大环境中形成若干个较为开放的小环境。与国立大学相比较，教会大学的中国师生与西方文化乃至西方社会有较多直接的接触，思想比较活跃并且享有较多的自由。同时，也由于更为经常直接感受某些外国势



力政治、宗教、种族偏见的刺激，比较容易触发民族反抗情绪乃至滋生革命思想。所以，历次反帝爱国运动与民主革命运动，都有大批教会大学师生积极参加，有的教会大学甚至成为爱国民主运动的重要据点。从这个角度来看，教会大学史对于研究近代中国政治史、革命史也有一定意义。

近代中西文化交流史，是一个双向对流的运动过程。中国教会大学既是基督教文化与近代西方文明的载体，同时它又处在东方传统文化环境与氛围之中，因而不可避免地要逐步走向本土化、世俗化。中国教会大学的发展，归根到底，还得取决于它对中国国情与社会需要的适应能力。许多长期在中国教会大学工作的西方教职员(包括一些传教士)，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中国文化的熏染，在不同层次与不同程度上吸收中国文化，并且将其带回西方故土。所以，对于有些西方人来说，教会大学又是一个观察、了解中国文化与中国社会的不大不小的窗口。我想，探讨中西文化的双向流动，可能会成为教会大学史研究中很有趣的课题。

无庸讳言，一些教会与教会大学曾与西方殖民主义及所谓“为基督教征服中国”的宗教狂热有过不同程度的联系。也正因为如此，教会大学曾引起众多中国人士的反感，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非基督教运动以后，它长期被人们看作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文化堡垒。但是，以现在的眼光来看，这种尖锐的批评虽然不无依据，但却失之笼统与有所偏颇，因为它没有将教会大学作为主体的教育功能与日益疏离的

宗教功能乃至政治功能区别开来，也没有将学校正常的教育工作与西方殖民主义的侵华政策区别开来。这种偏颇的评价，对于那些勤恳的毕生奉献教育事业的中外教职员，很难说是公正的评判。今天，我们已有可能并且应该排除民族情绪与历史成见中的某些偏颇因素，更为客观地、全面地、科学地从事中国教会大学史的研究，从各个侧面与不同层次探索其发展流变与社会效应。

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大家都能理解的原因，教会大学在中国大陆突然消失了。正如曾在金陵大学任教多年的芳威廉博士(William Fenn)所言：

在二十世纪上半叶划下句号时，中国教会大学可以充满骄傲回顾既往，也可以怀着足够的自信看待现实，但是却未必有对于未来的希望。

建筑和设备仍然留存，教师可能在新的学校任职，但教会大学从此消逝。结局是悲剧性的，但故事本身并非悲剧。中国教会大学这个名字，将被视为大西洋两岸基督徒对太平洋东岸伟大人民的辉煌贡献而永远铭记！

今年10月是我曾为之工作半个世纪以上的华中师范大学的百年校庆，也是其前身文华书院创建一百三十二周年，谨以这套图片集献给所有曾在中国大学校园内勤劳耕耘过的中外先驱者！

章开沅

2003年春于桂子山麓



目 录



缘起与奠基	3
初步发展	23
抗日战争时期的兴旺与发展	53
辅仁大学后期	95
辅仁大学在台湾	119
学术与校园文化	125
爱国民主运动在辅仁	163
附属学校	175
情系辅仁	187
大事年表	201



缘起与奠基

辅仁大学是一所天主教大学。天主教并非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而是由传教士从西方传播进来的。

天主教是西方基督教中的一大教派。基督教经过古代罗马帝国的分裂和近代欧洲宗教改革运动再次大裂变，一分为天主教、新教、东正教等三大教派。三者水火不容，互相抵牾。在中国，天主教又称旧教，亦称公教，新教通常称为基督教，又称耶稣教。

基督教在分裂前曾两次传入我国。最早是在公元七世纪的唐代，当时叫做景教。第二次是在十三世纪的元代，当时叫做也里可温教。基督教这两次的东传，对我国的文化教育活动影响甚微。

随着新航路的开辟和海外殖民活动的开展,在十六世纪的明末,天主教传教士沿着早期海外殖民者所走的路线东来,相继踏上中国进行传教活动。并广译西书,介绍西方数学、天文学、生物学、地理学、历史学、教育学、绘画等西学知识,对明末清初的文化思想、科学、教育等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后来,由于罗马教廷与清政府之间发生“礼仪之争”,到十八世纪,雍正皇帝颁布禁教令,再加上清政府实行“闭关自守”政策,天主教势力在中国暂时衰落下来。

1807年,英国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远航东来,揭开了新教在近代中国传播的序幕。两次鸦片战争后,《南京条约》、《望厦条约》、《黄埔条约》、《天津条约》等不平等条约的相继签订,西方传教士取得了在中国自由传教、办学的权利。自此开始,一批又一批新教、天主教传教士如潮水般地涌入中国各地,从事讲经布道、办学授徒、译书办报等活动。

教会在近代中国的办学活动首先是新教传教士肇始的,这就是1818年马礼逊的助手米怜(W. Milne)在南洋的马六甲设立的英华书院。1835年,郭实腊夫人(Mrs. Gutzlaff)在澳门创立女塾,这是在中国本土所出现的第一所教会学校。耶稣会于1850年在上海徐家汇创办徐汇公学,则掀开了天主教在近代中国办学的历史。无论是新教学校,还是天主教学校,它们在中国都经历了从初等教育,

到中等教育,再到高等教育,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则主要以初等和中等教育为主。据统计,1875年,全国教会学校总数约八百所,属于小学性质的约占百分之九十三;到1900年时,教会学校总数达到两千所,学生四万人,其中百分之九十是小学程度。但是,在十九世纪末,新教传教士在继续创办初、中等学校的同时,已经把高等教育作为发展在华教会教育的重点。1882年,至少有一所新教教会学校已具有高等教育性质,1894年,发展到四所,二十世纪初,已增加到十余所。而天主教各修会的传教士仍旧把初等教育作为办学重点,以至于,到二十世纪初叶,在华天主教学校总数远远超过新教学校。如1914年,天主教学校共八千零三十四所,新教学校共四千一百所,只及天主教的一半。而此时的天主教大学,仅有中国天主教耆宿马相伯于1903年在上海创办的震旦学院一所。

中国天主教大学迟迟不能创立起来的根本的原因,是与把持中国天主教会的法国教会的保守意识有很大关系。自十九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天主教会并不是由世界天主教的总枢——罗马教廷直接管理,而是授予法国教会保教权,由其代管。法国教会一直奉行向中国社会下层或贫穷无识之民传教的政策,办学思想也就仅限于创办初等学校和教理学校,没有像新教士那样意识到在华办高等教育以培养高级知识分子的重要性。1898年,清

政府创办京师大学堂时，曾商请天主教北京监牧孟振生主教(Joseph Martial Mouly)主持，而被婉拒，旋改聘新教士丁韪良(W. A. P. Martin)任总教习。辅仁大学也是在中国两名天主教领袖英敛之、马相伯经过长时期的积极争取、活动、筹备之下，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在北京创办起来的。

辅仁大学与其他教会大学相比，尽管创办较晚(1927年)，存在时间不长(仅二十三年)，但是，它曾是名师荟萃和四方莘莘学子向慕之所，并有它自己的办学特色，培养出了不少杰出人才。

一、英、马上书教皇兴学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宣告中国两千多年的皇冠落地，次年，民国成立。共和制度确立，万象更新。

中国公教精神领袖英敛之、马相伯有感于英、美、德等国的新教士在华创办大学，提倡学问，而“独我罗马圣教，尚付阙如”。为了振兴中国公教教育事业，1912年9月20日，由英敛之亲自起草，英、马二人联名上书罗马教皇碧岳(沛猷)十世(Saint Pius X)，派遣教中博学硕德之士来华，在北京创办大学，广收教内外学生，发展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介绍世界新知识。他们指出，适此政体改造，新政府实行信教自由，新的文化教育方兴未艾，

在华创办大学，时机方熟。上书千余言，语重心长，情文俱佳，罗马教廷颇为心动。不料，两年后(1914年)，碧岳十世去世，本笃十五世(Benedict XV)继位，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在华兴学之事就此暂时停顿下来。

马相伯(1840—1939)，1840年4月7日出生于江苏丹徒(今镇江市)，原名志德，后改名良，字相伯，晚年号华封老人。十二岁时，他瞒着父母只身远赴上海，进了法国天主教士办的徐汇公学读书。在读期间，数理化和外文都学得很好，尤其是法文成绩最为优秀。1862年，入徐家汇天主教耶稣会初学院，接受“神修”训练，1870年得神学博士衔，被授为神甫，成为耶稣会教士。晚清时期的中国屡遭列强侵略，使他产生了强烈的爱国思想，十九岁时，上海的法国领事想请他当领事馆的翻译，当时正值英法两国对中国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他一口谢绝说：“我习法文，是为祖国用的。”他与胞弟马建忠都曾入晚清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幕，参预洋务活动。游览过美、英、法等国，考察商务，参观了英国牛津、剑桥等大学。

马相伯生活的时代，正是国家日益衰败，屡遭列强的欺凌的晚清和民国时期，使他产生了强烈的“教育救国”思想。他说：“不读书，不足以救国，不研究深邃科学，更不足以救当前之中国。”他把教育救国的希望寄托于天主教会，将属于自己名下的祖遗产——松江、青浦两县良田三千亩，捐献

出英公之手也。以其有關教史，而又從未公布，特錄於左：

至聖父師慈鑒：今八月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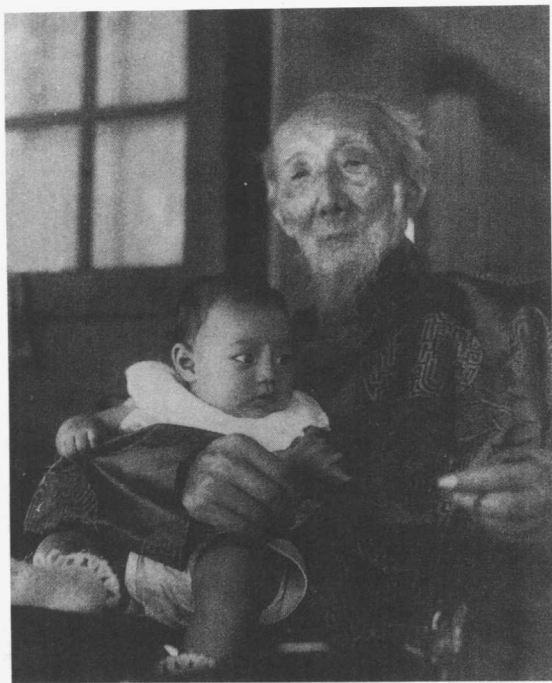
蒙

[illegible]

美之耶，耶穌教人都有。獨我羅
馬！聖教以北方而論，中我聖教
哉！無大也，而無中學，只有法
並正學式，高小而成之後，只依
文師大學託我傳教士矣。詎
京辭不受，該生使教外士清已
竟由是於今更盛。自舊清已
躋政府，非見擄也。而我教
獨見擄焉。非見擄也。蓋來
華傳教士喜用學問誘掖者有
幾，初觀在會與不在會之修
道生，其肯遣往羅馬攻書者
有幾，則其培養教友之心，
不願追步利南等可想。利
南等固當時歐學而上自天
文，入我華者也。無怪何未
輪初入人才輩出。今也如
教力所養成者，惟魯而已。
苦筆作數行通求能略知幾
援民主星而行。致令我國雖
落晨星。致令我國雖改
爲民主星。致令我國雖改
議者無人。致令我國雖改
一府縣議事省議員選會
人鄉一市之議事員者，無
一人。豈非放棄權利，自
汰之數乎？不棄與

聖座諭令，競爭國地平方
型會權之用意，背道而馳
一側聞聖座，說今日時機
遲東在大學，以則時熱創
通善之迎子弟，足聯以成
國之父兄，其益勝於和約
之保障，十百千倍。伯多祿
舍之以漁人，術智其伯多祿
教乎？其在斯乎？不終漠然置

[illegible]



辅仁大学创始人之一马相伯先生（1939年）

给耶稣会，专门用作办学的财产。耶稣会接受了财产，却并未如他所愿，在华办学。1903年，他在南洋公学（上海交通大学前身）教师蔡元培的帮助下，在上海徐家汇，借天文台东边一幢非常简陋的小楼为校舍，自办大学，取名震旦学院。“震旦”意为“东方光明及前途无量”。自任总教习，聘耶稣会教士为教师，以崇尚科学、注意文艺、不讲教理等三原则为办学方针。1908年，震旦学院拟在法租界建设新校舍时，马先生捐献现金四万元，在卢家湾购地基一百亩，又捐出英、法租界内地基八处，约值十余万元。这样，马先生为了震旦学院，几乎是倾其全部家产。



辅仁大学公教师生谒见公教元老马相伯，前排中坐者为马相伯，后排站立者右二为生物系主任张汉民、右三为训育主任伏开鹏

1912年，马相伯到北京，就任袁世凯总统府高等顾问，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在此期间，他极力支持英敛之在北京创办一所天主教大学的想法。

英敛之（1867—1926），名华，字敛之，又号安蹇。生于北京。他虽是满洲正红旗人，赫佳氏，但出身寒微，幼年家贫。当时旗人照例要习武，经过挑选，名列军籍才能得粮饷。为了一家人生活，他自幼挽弓操臂，练就了一身好武艺。后来，他渐渐发现武艺已不为当时社会所重视，也无助于改善家庭生活，便又弃武从文。他父亲和长兄都是体力劳动者，他完全是依靠自学，博览群书。他生长的时

代正是吏治腐败、政治黑暗的清末。他认为国家衰亡和百姓生活苦难都是官僚所造成的，因而一生最憎恨当官的，并立志不做官。近代著名启蒙思想家、西学翻译家严复曾写过这样一副对联称赞他：“能使荆棘化堂宇，下视官爵如泥沙。”同时，在那样一个列强环伺、民族危亡的时代，也使他形成了一种刚毅不屈、忧国忧民、胸怀大志的性格。

他二十二岁时开始信奉天主教，自习了一些法文，从此和天主教以及一些外国神甫结下了不解之缘，并接触到西方政治学说，从而产生了只有改革旧制，全面学习西方，才能救亡图存。1898年，三十二岁的他参加了康有为、梁启超领导的戊戌变法运动，并写下了《论兴利必先除弊》的文章，对康有为的变法主张大加赞佩，说它是“今日之顶门针、对症药，痛快切当，言人之不敢言。”不久，戊戌政变发生，英敛之怕受株连，便离京潜逃南方。真是无巧不成书。英敛之从天津乘船逃往上海时，正与他所心仪的变法领袖康有为搭乘同一条船——太古轮船“重庆”号，并彼此进行过交谈，遗憾的是互不知对方姓名。此后一段时间里，他为了生计，奔波于云南、上海一带。1901年4月自上海返回天津。

回天津不久，正巧有一位名叫柴天宠的天主教友、资本家，提议集股在天津开办一个报馆，由英敛之主持。经过一年多的筹备，1902年6月，报纸正式创刊，取名《大公报》。



辅仁大学主要创始人英敛之先生

他身兼总理、撰述、编辑等多项重要职务，总揽言论和经营的全权。他开宗明义地标明该报的宗旨为介绍欧西学术，启牖民智。并写诗明志：“献身甘作万矢的，著论求为百世师。誓起民权移旧俗，更研哲理牖新知。十年以后当思我，举国犹狂欲谁语？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阔立多时。”他主持《大公报》十年间，敢与高官对抗，敢于为民请命，甚至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在创刊后刚刚五天，他发表《论归政之利》的长篇论说，就放胆敢言劝慈禧太后撤帘归政于光绪皇帝，并指名痛骂慈禧亲信“刚毅国贼，祸国殃民。”又与

慈禧新宠袁世凯顶撞斗争了十年。身为直隶总督的一世奸雄，而且总督府就设在天津的袁世凯始终对近在咫尺的他奈何不得，强压不倒，收买不了。表现了英氏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概。英敛之及《大公报》为此以“敢言”之名，誉满全国。在他的主持下，《大公报》很快便成为华北的第一大报、舆论的中心。

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他从《大公报》退下来，移居北京香山静宜园，专心钻研天主教教义，著书立说。因所居静宜园在一片松树丛里，于是自号“万松野人”。著有宣传教理的《万松野人言善录》，成为天主教在北方的领袖，有“南马(相伯)北英(敛之)”之说。为了兴西学、启民智，天主教南北两位领袖携手联合，积极筹办中国天主教大学——辅

仁大学。

出于对中国社会状况的极大不满和要求改变现状的强烈愿望，英敛之执著追求全盘西化的精神。这种执著不仅表现在文化思想上，而且还体现在生活方式上。由于他的执著，曾经闹了不少笑话，并得了个“怪人”的称号。

英敛之三十岁后，经他学文的老师的介绍，与爱新觉罗·淑仲结婚，夫人是皇族，受过很好的文化教育，能作诗，韵律甚工。英氏的《也是集》内附有夫人的诗四首。

自晚清以来，随着西学在中国的传播不断扩大，对青年学子影响很深，但是在他们身上渐渐出现了一种不重视甚至放弃中国文化的不良倾向。这对英敛之的思想触动很大，鳃鳃然以国学沦丧为忧。于是，他想法创办



1917年8月英敛之、陈垣与辅仁社同仁摄于香山静宜园，中间坐者为陈垣，其左为英敛之

学校，既能学习西方科学，又能发扬中华固有文化。这既是他与马相伯联名上书罗马教廷时表达出的中心思想，更是他晚年创办辅仁社时积极实践的办学思想，这一思想后来并一直影响乃至贯彻于陈垣领导的辅仁大学的始终。

二、香山授徒

静宜园，位于北京西的香山，为清代皇室五大园林之一。园中古木葱葱，清泉冽冽，远隔尘嚣，逸趣丛生，可谓一绝妙读书之处。清帝逊位后，由喀拉沁王福晋及英敛之夫人爱新觉罗·淑仲等人，向皇室请领静宜园，兴办女学。逊清隆裕太后慨然应允，推英敛之董理其事。1913年，英敛之从天津返回北京后，于秋季在静宜园创办静宜小学、辅仁社，招收天主教青年，传授中国文化知识。因此，这里成了辅仁大学的前身——辅仁社的发祥地。

英敛之尽管是全盘西化论者，但并不是民族虚无主义者。他希望西方天主教与中国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培养中国天主教人才，实现天主教的中国化、本地化。于是，创办了辅仁社。“辅仁”者，取自孔子《论语·颜渊》中的“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就是要保存国学、发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的意思。随后，英氏去函国内各主教，请求派遣教中有志青年，前来攻读。结果，山东兖州、河南卫辉、四川成都、重庆及河北各教区纷纷响应，二十余人负笈来学。社中备有古今书籍万卷，名人字帖百余种，英氏亲自授课，讲授中文、历史、书法等。还拟定《唐景教碑考》、《元代也里可温考》、《清四库总目评论教中先辈著述辨》等课题，学员按课题定期撰文，称为“社课”。学习期为两年，学生随来随去，随来随学。来学诸生志愿宏大，勤苦向学，两年后，进步较大，略识国学门径。临别时，英敛之亲自撰写辅仁社同学纪念书一封相赠，以示勉励。辅仁社开辟了中国天主教人士研究国学和教会史的先声。

1917年夏季，河北一带发生严重水灾，很多人流离失所，民不聊生。熊希龄在香山设慈幼局，以救济受灾儿童，聘请好友英敛之为局长。是年冬季，又募集款项，开办粥厂，赈济贫民。这样一来，救济事务繁重，日无暇给，他在辅仁社的讲学工作已无法兼顾，只得暂时停办。

辅仁社在香山开办期间，有一位对后来的辅仁大学有重要影响的名叫陈垣的人，正巧来到北京，与英敛之相识，很快成为忘年之交。陈垣为广东共进会成员，原来在广州一直从事医学教学和研究工作，民国初年，当选为众议院议员，满怀信心地“蠹笔走京师”。



1912年5月广东医学共进会欢迎孙中山纪念留影，前排左起第五人为孙中山，第三排左一为陈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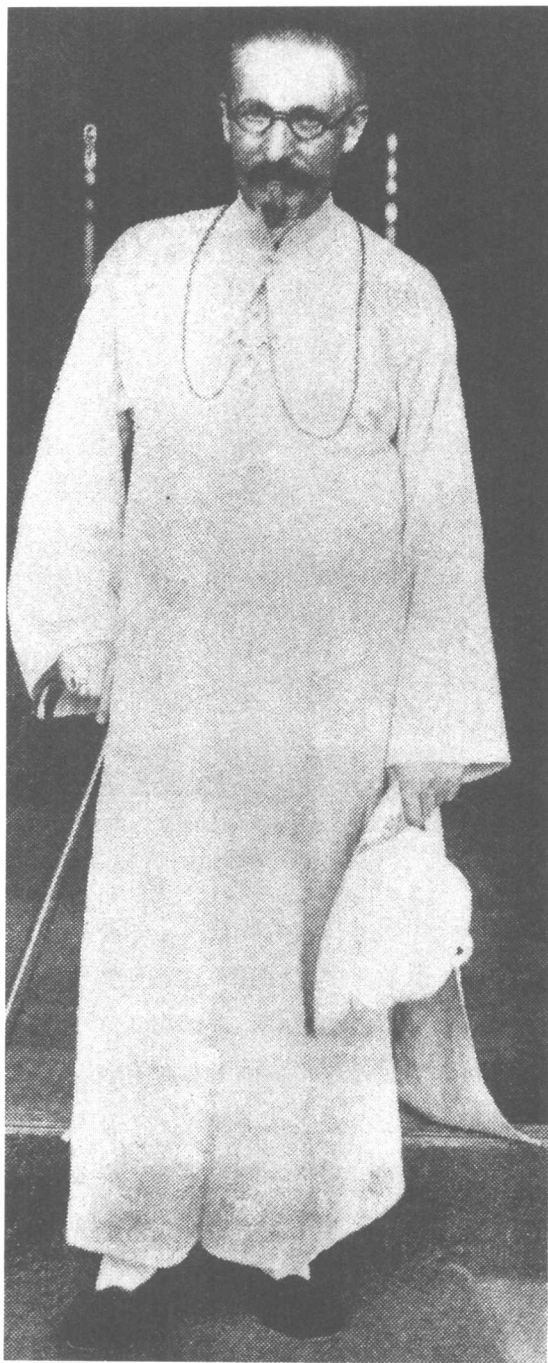
最初他还积极地与会参政议政，但很快发现议会只不过是北洋军阀和政客们争权夺利的场所、欺世盗名的工具，幻想破灭了。北京丰富的文化典籍给了他新的寄托和满足，转而沉浸在书海中去了。他时常到香山辅仁社中与英斂之探讨文史，颇有启发。一次，当陈垣听到英斂之为学生们出了一个《元代也里可温考》的社课时，很感兴趣。回去后，自己也动手查资料，并写出了同一篇论文《元

也里可温考》一卷，出示给英斂之、马相伯先生。两先生看后，大为惊叹，认为是一篇难得的佳作。马相伯致信英斂之说：“吾与汝弗如也。”英斂之当即允诺愿为其付梓面世。该文是陈垣的宗教史乃至史学处女作，它的发表，从此改变了陈垣研究的方向，并为英斂之选定他为接班人、掌舵未来辅仁大学奠定了重要基础。

三、奥图尔博士受派来华建校

香山辅仁社前后共办了四年，四方来游的公教学生甚多，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这些青年文化底子太浅，学习时间仅短短两年，无法取得明显的成效。区区一个辅仁社，无法根本改变天主教在中国的文化教育不振的状况。对此，英敛之甚感忧虑，兴学的信念变得更加强烈。于是在1917年6月，他撰写《劝学罪言》一文，再次上书罗马教皇本笃十五。反对由法国天主教士所控制的中国天主教会一贯实行的向“愚鲁之夫”传教的保守政策，大声疾呼“以文学为第一要务”，“谆谆以读书尚学为劝”。文凡四千余言，款款赤诚，跃然纸上，教皇深为嘉许。加上来华的其他国籍的天主教神甫的影响，1919年11月，教皇发布告世界天主教会的普世通牒，谕令各地教士注重学术传教，切中了中国天主教会的多年积弊。1922年，意大利人刚恒毅(Archbishop Celso Costantini)被罗马教廷直接任命为驻华宗座代表，并于年底抵达北京。从此法国教会在华教权被否定，创立中国天主教大学的障碍扫除了。

1919年春，罗马教皇特派教务巡阅使光若翰总主教(Mgrde Guebriant)，考察中国各地天主教状况。结果，反馈的意见大多为中国天主教高等教育尚属缺乏，乃目前急待开展的工作。光总教返回罗马后所呈报告，多



罗马教宗首任驻华代表刚恒毅总主教